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PV.2355

22 September 1975

CHINESE

第三十届大会

大会

第二三五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一上午十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托恩先生 (卢森堡)
后来由副主席代行职务：哈利法先生 (巴林)
(副主席)

- 分配项目：总务委员会的第一次报告
〔分配议程项目 125〕〔8〕〔续〕
 - 开始一般性辩论〔9〕
- 下列人士发了言：

阿泽雷多·达西尔维拉先生 (巴西)
基辛格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蒙铁尔·阿圭略先生 (尼加拉瓜)
曼顿古·布拉·尼亚蒂先生 (扎伊尔)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LX-2332 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会议在上午十时五十五分开始

议程项目 8 (续)

分配项目：总务委员会的第一次报告 (A/10250) [分配议程项目 125]

主席：各位记得，总务委员会建议直接在全体会议上审议议程项目 125，并建议主席应当进行协商，以便就应当如何处理该项目取得一个共同意见。经过整个周末就塞浦路斯问题这个项目的分配作出协商后，我想告诉大家，我们对该问题还没有取得一个共同意见。

为了帮助大会的工作，我要提议，在处理这个项目时，我们最好沿用第二十九届大会对这点所定下的程序。当时布特弗利卡总统宣布大家已取得这样的谅解：当大会审议该项目时，大会将请特别政治委员会开会，以便给塞浦路斯两族的代表在委员会发言并表示意见的机会。大家了解到，大会然后会重新审议该项目，同时顾及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罗斯迪斯先生 (塞浦路斯)：主席先生，我刚听过您的发言。我要指出，我们并不反对去年的程序。但是大家必须记住，自去年起，土耳其利用其在侵占区的军事占领地位，采取了很多片面行动，想对塞浦路斯实质问题造成既成事实的片面行动之一就是通过土族塞人领导人，宣布成立一个分立的所谓“塞浦路斯土族联邦”。安全理事会在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二日第 367(1975)号决议执行部分第二段中对这个行动加以非难；在利马举行、代表了大多数大会的会员国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彻底地谴责了这个行动。

因此我们要应付一种形势。我们从前有过这样的经验：在今年六月，当土族塞人代表想在安全理事会发言时，安全理事会主席就给他一个发言机会；但条件是他应以私人身份发言。但是，他一发言就忽视了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决定，并且开始解释所谓分立的塞浦路斯土族塞人邦。这样，讨论有关该邦等的问题就造成了一

种有异于安全理事会审议的问题的气氛。

因此，我们想防止今天发生同样的事情，如果我们单是采用去年的程序而没有注意到他们违反一九六〇年的塞浦路斯宪法，宣布成立所谓分立的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这个专断的非法行动，就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土族塞人依赖宪法得到过分的权利，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违反国际法和所有的合法概念。

因此，我现在提议，我们可以沿用去年的程序，但是要指明我们同时适当地注意到安全理事会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二日第367(1975)号决议执行部分的第二段；该段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用意是提醒土族塞人与会者必须依照他自己所要求做的来行事，即代表土族塞人发言；因为如果他请求代表所谓分立的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发言，就不会获准发言。他不应该俨然以所谓塞浦路斯土族塞人邦代表自居。这就是我提议的目的。

因此我要向大会提出下列的提议：

“为了给土族塞人一个表达意见的机会，仍然沿用大会去年对该项目通过的程序，土族塞人代表将以这样的身份发言。应该记住塞浦路斯只有一个国家，即联合国承认的塞浦路斯共和国。

“上文提到的去年的安排程序原文如下：

“大会在审议该项目时将请特别政治委员会开会，以便给塞浦路斯两族的代表在委员会表示意见的机会。然后大会将重新审议该项目，同时顾及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这就是我提议应该沿用的程序。我想请主席将我读的案文付诸表决。

主席：按照协商，我作出了一个提案，我满以为大会几乎一致支持该提案，但是塞浦路斯代表作出一个反提案，如果是要将其付诸表决的话，就应当书面提出，而且一定要有译文本，然后分发给所有的代表团。

我向塞浦路斯代表再作出呼吁：如果不能取得一致的协议，我会请大会推迟审

议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我们不应当继续拖延大家急于要开始的一般性辩论。按照规则，我认为我们不应在辩论时将程序和实质混为一谈。因此，我认为去年达成的解决办法使塞人两族代表能够发表意见——如果他们想这样做的话。我认为这样就够了；因此我并没有单单提到塞人，因为大会去年曾表示希望所有想表达意见的各族都有机会这样做。这个说法也隐含了选择“土族塞人”而非别族的意思。因此，当另外的一族表示希望发言时，我们最终也要在大会上审议的。

大会知道那些国家得到承认，那些国家是会员国。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应该将有关程序的辩论发言列入；特别政治委员会在程序结束前可能要将该程序付诸表决。

因此我要请问塞浦路斯代表是否坚持要将他本人的提案付诸表决；我又要请问大会我们是否应该将这个辩论推迟到明天，以便我们现在在等待分发文件时可以开始一般性辩论。但是我接受任何可能提出的程序上的提案。

罗斯迪斯先生（塞浦路斯）：主席先生：我听不到有任何人反对我的提案。如果有人反对的话，按照我们的议事规则规定，唯一的办法是听取每一方三位代表的意见。如果没有人想发言的话，那么就应该将提案付诸表决，了结这件事情。我认为这个分配问题不应该再继续占用大会的宝贵时间，这是很简单的事情。我们并非没有达成协议，因为协议几乎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将提案付诸表决吧。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害怕将诸如此类的提案付诸表决。我们要将其付诸表决，了解这件事情，然后让大会继续其正常的程序。大会的宗旨是以表决的方式决定问题，不是无期地拖延问题，不是为了取得一致意见而无法决定问题，凭什么说分配一个项目一定要取得一致意见？过半数就行了。

因此，主席先生，很抱歉我要坚持将该项目付诸表决。我听不到有人反对，但是如果有任何人反对的话，那么应该将我的提案付诸表决。

主席：你在大会的经验比我的丰富。但是，我要援引议事规则第七十八条，并且要维护这条议事规则：

“提案和修正案通常应以书面送交秘书长，由秘书长将复制本向各代表团散发。作为一般规定，任何提案不得在大会会议上加以讨论或表决，除非其复制本至迟已于会议前一天散发给所有代表团。”

大家都熟悉去年的提案。两天以来这个新提案成为商谈的对象。除了塞浦路斯代表之外，大部分代表同意我的提案。这个提案包括了好几点；如果要大会在没有得到实在的文件之前将其付诸表决，就会迫使大会仓促从事。

理查德先生（英国）：我虽然非常尊重大会，但我觉得大会似乎有混淆两个问题的危险。我们今天早上审议的议题是分配项目，即原则上我们应该决定需要将其分配在何处的問題。在讨论时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有关各族应该怎样派代表参加嗣后有关该项目的讨论，他们应该怎样发言，在什么地方发言，而且我猜想应该怎样介绍他们等问题。

主席先生，我们本来十分希望你在周末进行的商谈到现在圆满结束，以便可以毋须进一步的争议将项目分配好。我们仍然认为，从现在直到真正对这个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项目进行讨论时，您进一步努力就会使各方之间终于达成协议。因此，我们深信，只要能够在较为轻松的步伐下进行协商而不必受到两天期限的压力，您一定会成功的。

因此我要正式提议——我相信我这样做完全合乎程序，因为在总务委员会报告中的大会议程上已列有这个项目——我们现在就决定分配塞浦路斯项目给全体大会审议，并且期望和希望主席先生继续您的协商工作，以便就最好怎样给土族塞人一个机会对这个项目发言的问题找出一个解决办法。对我国代表团来说，我们认为去年定下的安排办法是最恰当的；这个办法是让两族的代表在全体会议开始正式辩论之前向特别政治委员会发言。

我们期待您在成功地完成了协商工作后、开始讨论该项目前、给我们作出一个报告。在我看来，如果我们继续象今天开始的这样辩论下去，等到实质性辩论时，

对两族怎样能最好地处理这件事的问题，我们就有很大的危险会作出冗长的和也许是剧烈的争执。因此我建议大会决定将该项目发交全体会议，但是在今天早上就做到这样为止；主席先生您继续您的协商工作，看看最好怎样可以迁就两族；当这些协商工作完满结束时，以及开始讨论实质性项目之前，请您再向大会作出汇报。

主席：谢谢您的建设性提议，所有请求发言的人是否都同意这个提议？

特克曼先生（土耳其）：不久前我已说过，我们投票反对将塞浦路斯问题列入大会议程，因为我们觉得只要一天不能解决关于使两族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个问题，我们就一天不能投赞成票。我们的立场是依据一个坚强的信念：没有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承认为主要及直接有关的各族的参与，就不可能对塞浦路斯问题作有效的辩论。

主席先生，我要感谢您为了在今天的会议开始前对这个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作出的一切努力。我们充分预备支持您关于应该重复去年的裁决的提议。我们一定支持这个提议，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能接受别的提议。

代表希族塞人的大使提出了另外一个提议；我没有这个提议的案文。他谈到对这个问题的一致意见。土耳其也是联合国的会员国，所以一致意见应该考虑到我们的意见。我说过，我们连提议的案文也没看过。

同样地，我们不能接受英国代表的提议。因为列入和分配该项目的问题同我们为了使两族能够发言而要采用的程序是密切相连的。英国代表一定会记得，去年这个问题是在分配项目给全体会议时决定的。我们现在不能改变这个程序，因为这意味着永久拖延两族发言权利的问题，而且我们对可以用于这方面的拖延策略也知其一二。

罗斯迪斯大使又利用了这个机会对土族建立联合邦的决定作出某些攻击。我要再说一遍，土族的所作所为并不等于成立一个独立国家。土族联合邦并没有声言

有对外自主权，其目的主要是在塞浦路斯建立一个联邦国家，并且曾多次宣布愿意按照将来的联邦宪法来修订其本身的宪法。

因此我们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土族请求依照大会决定，以土族代表的身份向大会或委员会发言。但是我们也应该接受一个事实：土族不能同意依罗斯迪斯大使规定的条件发言。

主席：我所关怀的是推动大会的工作。因此，在请其他人发言之前，我要请各位清楚英国代表的提议。我必须澄清某些误解。这并不意味辩论将永远得不到结论。英国的提议是（如果我说错了，请纠正我），我们应该继续进行协商和接触，而且在可以开始讨论前，要对辩论的进行方法作出一个提议。因此，这个提议并不是无限期的拖延下去，而是不要在今天就作出土耳其代表刚才所说的程序决定，只要在塞浦路斯问题的辩论开始前作出决定就行了。既然我们提到协商，我要指出，各方都不反对听取土族塞人代表的发言。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取得某些安排，又请各位不要将问题的实质同我们今天进行的程序上辩论混淆在一起。

我现在请想对英国提议发言的代表团发言。

罗斯迪斯先生（塞浦路斯）：我认识到，除非主席有意依照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采取不同的行动，否则我的提案、就需要早二十四小时通知印发，才能付诸表决。英国代表的提案并不是任何文件上的问题，而是与分配项目有关的问题。因此，我认为如果有任何人反对的话，可以将其立即付诸表决。如果没有人反对，则维持原议。我并不反对该提案。

主席：我要再谈谈英国提案，在看看是否有需要进行表决之前，请问大会有没有任何人反对该提案。如果没有人反对，我们会节省很多时间。

由于没有人反对英国提案，所以我就认为大会通过该提案。

就这样决定。

主席：为了更加清楚起见，我要指出英国提案要求：一、将该项目分配给全体大会；二、请主席继续他的协商工作，并且尽可能在实际讨论塞浦路斯问题之前根据共同意见作出提议。然后再根据共同意见或多数表决对辩论所采取的程序作出一个决定。

既然没有人反对，我们就这样进行。

议程项目 9

一般性辩论开始

主席：今天上午我们开始一般性辩论。请第一位发言人发言之前，我要提醒各位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九日大会第2353次全体会议通过的有关一般性辩论程序，特别是涉及发言人名单和行使答辩权的决定。为了便于大会工作计划，大会也决定于后天即九月二十四日星期三下午六时截止一般性辩论发言人名单。因此请要参加一般性辩论的代表于九月二十四日星期三下午六时以前向秘书处登记。

阿泽雷多·达西尔维拉先生（巴西）：主席先生，首先，我表示巴西代表团对阁下被选为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届常会主席感到满意。卢森堡具有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的长久历史，加上阁下个人的品德，本届会议的成就可以预期。

我也很荣幸能代表巴西代表团向指导了第二十九届常会和刚刚结束的第七届特别会议的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卓越的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先生的献身和效率致敬。

巴西代表团开始一般性辩论的传统方式，使我特别满意能率先欢迎这个组织的

三个新会员国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和莫桑比克的代表团。巴西和这些国家在许多方面有共通的过去纽带，因此有特别密切的关系。现在我们希望这个关系将来化为合作和了解。我确信这三个会员国在这个组织里将带给国际大家庭许多好处。

在欢迎参加本组织的新葡萄牙语国家时，我要表明巴西是以兄弟般的了解注意正在开始的安哥拉非殖民化过程。由于历史、血缘关系，巴西感觉和这个未来的新非洲国家息息相关。这个关系强调了横跨大西洋兄弟般的精神而产生的共同利益。我们希望那些大力促进安哥拉解放的人士能克服目前的困难，使这个新国家政治稳定，确实保障领土完整和独立，不受任何性质的外国干预。

本组织存在了快要三十年。对个人而言以及对一个机构而言，三十年的生命有重大的意义，而不仅是岁月如流。因为三十年之中，社会生活通常有若干根本的变更，并且和世代接替以及历史新陈代谢的节奏相合。联合国组织正在经历着一个生气勃勃的重大变革。我们都希望这种变革使联合国面目一新，使其对未来的艰巨任务有所准备。这个推陈出新不是自动自发产生的。这是本组织的成员，事实上也是本组织的实体，我们全体，所造成的。

评价本组织在这三十年的表现时，往往忽略了这个事实。因此国际大家庭遭到各种挫折时，总是归罪联合国这个组织，而大部分的情形，这些挫折是由于当前国际秩序先天性的限制引起的。本组织，不管组成结构如何具有弹性，不是在一个封闭系统里运作的，而是在时时与国际大结构互相影响的环境里运作的。

因此长久以来围绕着联合国活动的怀疑态度往往成为各国企图推卸失败责任的一种透过的方法。归根到底，这些失败主要地要由他们负责。就巴西来说，我们希望避免流于普遍悲观的心理，正如同我们断然避免同样不切实际的国际主义者的乐观的错觉。我们倾向于能够最有效实现宪章目标、认为联合国既有各种限制又可大有作为的严肃看法。

我们没有否认现实，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联合国没有实现被委托的如维持和平和

国际安全以及创造一个较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等这些重要领域的崇高目标。

关于联合国维持和平和安全的种种限制，最初习惯地把这些限制归诸于冷战的创伤。在超级大国之间利益常常发生冲突的时候，这种创伤瘫痪了联合国的意志。目前的倾向是责备缓和。缓和可免除联合国的介入，而使世界权力的两个主要中心之间有双边、直接的了解。无论如何，这是几个世纪的权力政治的结果，产生了不愿意接受目的是根据各国主权平等原则作为横的准则的联合国这样系统的活动，而赞成在宪章之外根据从属关系的纵的系统。就实现联合国的崇高目标说来，所谓的联合国危机是基于这个事实。它不是部分地甚或主要地起因于本组织结构上的毛病，而相反地是起因于不采取各国能力所及的方法而采取由权力上考虑产生的决定。

裁军谈判的长久历史是我刚才所说的一个显著例子。宪章的第十一条第一项和第二十六条明确地说“裁军和军备管制的原则”是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特别任务。然而多年来裁军谈判已经逐渐成为双边化，对事情所有的主动性限于两个超级大国，好象他们两国的安全在国际大家庭之上或之外，或者好象发展中国家没有他们自己的安全利益。好象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利益在质量上不同于大国甚或发达国家的安全利益。

分析联合国在经济领域的作法可以选出很有力的例证。在这个领域我们必须承认宪章对制定国际合作的目标和原则是不太明确。但是时代不同了。过去三十年里在普遍认识经济合作的真正重要性上已有很大的进展。联合国在这方面给予相关的帮助，作为主要集团间，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话的主要论坛。尽管本组织内增加了处理经济问题的专门论坛，可是对于旨在调整国际合作以促进国际社会平衡发展的建议，总是有人反对，特别是一些较发达国家的政府，固执地反对把这种建议作为指导原则。

这种想法不能排除我们要重新考虑本组织的机能和重新安排本组织的活动的责任。相反的，这种想法应该促进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

巴西全力支持宪章问题特设委员会的工作。但是我们了解，要使联合国赶上时代，除了修改宪章，必须包括通过某些措施能够马上单独地实施本组织基本文件修正条款。事实上，这件事涉及达到同样目的的两个必须同时进行的方法。

如修改宪法一样，修改宪章自然地引起没理由的热心和不合理的恐惧。我们应该通过客观的努力，区分出那些真正必须修改的条款，来节制前者并且驱散后者。尤其，我们应该避免宪章不需要的雄心过度的完美修改计划，而赞成按照三十年经验教导我们的改造宪章的实际修改工作。我们应该集中散在各种机构各别努力的结果，比如宪章问题特设委员会，维持和平行动问题特别委员会和联合国系统结构问题专家小组。最后，我们不应该忽略不须修改宪章的改革可能性。如果注意到这些前提，我相信由宪章第二十三、二十七和六十一条修正案的通过、一九六五年实施所获得的成就看来，很明显的，修改宪章在政治上是行得通的。在第七届特别会议，我有机会表示巴西对于国际经济关系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立场。工业化国家之间在经济关系上通行着一种合理有效的一套准则，而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却是通行着自由放任。直到最近，造成这样不对称的主要因素是由于发源于世界经济系统中心，即工业化国家的经济衰退现象，并且向周围方向即向发展中国家蔓延的结果。

由这个观点，我们认为较发达国家在国内范围内采取反恶性循环的调整措施，加上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和货币协定，这种危机是可以克服的。同样的，按照这种推理，世界经济系统中心国家和周围国家之间存在着客观的休戚相关的利害关系。发展中国家，首先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将因工业化国家之间重新推展交流而受益。

目前世界经济系统的危机和这个模式大不相同。这一次周围国家不再消极地忍受危机的影响，也产生了具有衰退性质的压力。我们深切地感到目前国际分工足以造成不稳定的潜力以及目前南北经济关系结构的危险性。今天我们再不能不认识到有必要将直到目前还只限于世界上工业化地区使用的一套准则推广到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

正是根据这些观察，巴西代表团在第七届特别会议上提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贸易总协定谈判以作为具体谈判的政治法律模式。这样的总协定不能取代目前有效的一些总协定，也不企图代替现有的会议和机构。但是这个协定必然地要努力弥合这些协定所遗下的空隙并且纠正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观点所产生的歪曲。

在那个场合，我们说明了我们认为由原则宣言和最高纲领派的主张过渡到谈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的具体准则的时候已经到了。

我们并不忽视大会和联合国其他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对促成普遍注意发展问题所起的和继续起的作用。在这方面，说明或重申都是切题的。我们发现，到目前为止，特别在辩论和对抗最激烈的时候，所发表的许多观点都已经是很成熟。我们认为已经到了进行各种谈判以导致全面的具体结果的时候。我们希望在过去及时警告所得到的成就上继续进行。就象我们认为来不及采取治标或小型的解决办法一样，我们认为时间已经到了要着手进行超乎警告和呼吁的方法。

我们提议的总协定将是所有这些的对照。它的结构将顾到操作的效率，并且直接而中肯的处理各种国际贸易问题。对发展中国家说来，这是个承认它们出口产品——不仅原料，并且包括逐渐增加的制成品——有权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问题。这也是个承认它们有权进入对发展过程不可或缺的物质或文化资产市场的问题。对发达国家说来，这是个相互地承认它们有权保证在公平价格情况下得到原料供应的问题，以相对于它们给发展中国家的各种让步。

这种总协定的谈判不应妨害在贸易和关税总协定范围内所获致的谅解。到目前为止，贸易和关税总协定主要照顾到工业化国家的需要。另一方面，总协定的谈判并不预断目的在保护生产特定原料的国家其出口收入的购买力的具体办法的谈判工作。如果有关各方面接受了若干一般准则，认为能够规范国际合作，所有这些努力将是相辅相成的。

第七届特别会议能用来完成其任务的期间无疑是太短了，使巴西当时提出的建

议无法受到深入的研讨。然而，我确信现在开始的常会可以审议这个建议。事实是在国际经济谈判的历史上，今天我们第一次真正有机会开始建立一个新世界经济秩序的工作。因为谈判条件较平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第一次能够达成具体的结果。

我们面前有长久的一般性辩论和复杂的议程。在今后三个月中，我们需要尽力而为。这段期间结束时，我们将在若干问题上获得进展，在另一些问题上进展得慢，或许某些问题一点进展也没有。多边外交作出决定的过程，就其本质说是个缓慢的过程，进行人的机敏和耐心是一刻也不可缺少的。但是要审议目前日益增加的并且有关许多国家利益的问题，除此之外，没有更有效的办法。

我们不可用算术来计算执行的决议、解决的问题和达成的目标，受数量的诱惑去衡量联合国的成就。联合国的影响是较含蓄的较广面的。应该以它在趋势和方向上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加以评价。同时，联合国的行动主要是靠思想和观念来完成的。历史上，思想和观念一向比人们所常常崇拜的权力等等是更有效的政治变革的动力。

基辛格先生（美利坚合众国）：首先，让我表示，我们感到十分高兴，因为今年卢森堡首相担任主席，主持我们的辩论。他对欧洲合作作出了贡献，他有外交技巧，他对民主忠心耿耿，这实在使我们深信，第三十届大会一定会充满建设性和创造性的精神。

我同时希望向秘书长致意。他本着公平合理的精神，发挥他的领导才干，孜孜不倦地作出努力，一心一德地要把这个组织推向为世界和平而进行合作的新纪元。

本世纪发生了空前大规模的战争和灾难。我们亲眼看到了既定的秩序型式和国际行为惯例的崩溃。本世纪遭受了全球性的经济萧条和周期性的饥荒。热核武器出现了，军备扩散于全球。我们的世界是不断动乱和意识形态分歧的世界。

但是本世纪也目睹了自决和国家独立原则的胜利。一个真正的全球社会已经

开始形成，这从众多的国际合作机构中反映了出来。我们订出了和平解决和限制军备的新办法，我们设立了促进经济发展和向全球饥饿和疾病进行战斗的新机构。

正当我们讨论将来的时候，本组织刚刚完成了可能影响深远的一件事情：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就改善人类经济情况所达成的一致协议。

意识形态和处理经济发展的方法纵使有所不同，聚集在这里的国家已开始认识到：我们的相互依存关系意味着共同进步或是共同灾难；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不能用压力 and 对抗来达到目的，企图这样做就会损害每一个国家。它们同意跳出过去的旧框框，来追求进行合作的将来。特别会议锻造了以各国的平等与合作为基础的目标一致的观念。现在我们必须全力以赴来执行这项一致意见。

让我们把和解的精神带到本届常会的辩论来吧！让我们同样本着我们有着共同命运的认识来讨论世界和平——我们在地球上所作一切事情的基础——的各种问题。我们的义务是避免空喊口号和作无休止的反责。

只有在合作的结构内，争端才能获得解决，冲突才能加以遏制。只有在和解的气氛里，才能减轻引起那么多冲突的各国的不安全感，才能培养妥协和忍让的习惯。社会进步、正义和人权，只有在国际紧张局势减少的气氛中才能发展。

美国现在准备献出自己的力量，努力合作来调和世界社会各种不同的见解，以便创造一种新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我们这样做，不是因为害怕，因为在对抗的形势中我们比大多数其他国家更能支持自己。我们这样做，也不是因为我们有犯罪感，因为我们相信，总的来说，我们用了我们的力量来达到建设性的目的。

我们重申我们有着共同的命运，因为我们认识到整个世界是相互依存的，因为世界要有和平，就必须相互依存。在处理国际议程上和平、安全、经济繁荣和正义等问题方面只有分担责任，除此以外，的确没有别的实际办法。

让我们谈谈美国对我们在每一个领域所面对的工作的意见。

我们最为关心的就是世界和平。和平永远不会自动到来。和平不只是没有战争。和平与安全是分不开的。在一个少数国家支配其他国家的生存的世界，压迫、不正义和恐惧一定会产生。没有均衡，便不能有安全，要安全，便不能没有约束。

只有在各国的权利都获得尊重、忍让代替武力的时候，人类才能把精力完全用在实现他的最大愿望上面。

美国将耐心地从事和平事业，并在许多方面抱持和解态度。我们将培养和加深我们与朋友们和盟友的合作关系。我们将努力与具有不同意识形态或政治信念的国家改善关系。我们随时准备协助解决区域性争端。我们将加紧努力，制止核军备的螺旋上升。我们将努力改善人类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加强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我们将为实现基本人权而奋斗。

美国同北美、西欧、日本各工业民主国家的紧密关系，三十年来一向是世界安定与和平的基石。今天，我们把视线超越当前的安全和防务，所以正在一同处理一系列新的问题。我们通过协商，已经开始共同努力，以减轻国际的紧张，协调我们恢复经济的国家政策，一同应付能源和环境等共同挑战以及谈论发展中国家所关心的重大问题。

本着这一个精神，美国已经同它在中美和拉丁美洲的邻国，开始了新的对话。我们已经采取重要步骤，去解决主要的政治问题；也开始了密切的协商，以便进行合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我们在西半球的盟友关系，是历史悠久、前途无限的。我们如果想法灵活，全力以赴，可以使美洲各国间在发展事业上的合作，成为全球社会的榜样和柱石。

要巩固和平，就必须把拥有毁灭地球武器的各国间的关系，建立在更可靠、更持久的基础上。

近几年来，上一代的两极对峙局面，已因对话开始和直接冲突逐渐减轻而成为过去。就所有的组织来说，联合国当然理解两个核超级强国之间紧张关系的减低对全世界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一切国家同这一缓和的成功，都是息息相关的。当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能在几分钟内跨越各洲的时候，核冲突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存。

我们承认，一个世代的猜疑和敌对，不会因为一个文件或一个会议而消失。思想上、政治上的差异的确存在着。我们要坚决地保护我们自己和朋友的重大的利益。但是我们也绝不应该忘记：在我们这个时代，和平既是道德上绝对必要的，也是实际上迫切需要的。我们将在严格的互惠基础上，努力缓和紧张局势。我们知道什么是姿态，什么是政策；我们不鼓励任何人可以制造紧张从中取利的想法。我们深信，我们对未来子孙负有责任，不能一时激动，而动摇不定。

今天的美苏关系，和十年前正好是一个尖锐的对比。今天的世界不再因持续出现的剧烈冲突而不断受到震撼。定期的协商，包括在最高阶层的协商，鼓励着双方自我节制，并且不断扩大着共同利益的领域。福特总统和勃列日涅夫总书记不久即将举行的会谈，应该会加强这一缓和过程。

互相节制的原则，已经在各种最高级会议中宣布；两个月前又在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上加以重申。这些原则，成为一种行为标准，我们的行动，就要以此为准，受到考验。如果双方遵守这些原则——我们坚持这一点——如果双方都不争取单方面的优势，那么，不但我们的人民，而且全世界各国人民都将摆脱全面战争的幽灵。我们当前的任务，没有那一项比这个更为重要。

同样地，我们也追求同东欧各国的更有建设性的、更为有利的关系。美国连同东欧各国的自豪的人民，有着许多传统的深厚的友谊关系。因为东西欧之间的壁垒逐渐消失，我们看到实际合作的机会越来越多。

美国对外关系里，没有那一项比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联系具有更重大的意义。我们相信，四分之一人类的幸福和进步，是全球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两国间几十年的敌对状态，已经由相互尊重的关系代替了——这种关系，是今天世界上持久的特征。这不仅符合我们两国的利益，并且也符合亚洲，以至全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广大利益。福特总统计划在今年稍后的日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肯定我们的关系是有活力的并在严格执行上海公报的基础上，推进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对于我们关系正常化的进行采取认真的态度。我们全心全力追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世界大家庭必须在区域性冲突扩大到成为全球性对抗以前，寻求方法，加以限制或解决。没有地方比中东更具危险性。没有地方比中东更显然有必要在互不信任的敌对者间进行持续而有创见的谈判。没有地方比中东会有把长期危机转化为和平的更大希望。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它的第 242 号 (1967) 和 338 号 (1973) 决议中建立了最明确的原则范围。

我们走向永久和平的道路是既长远又坎坷。中东所遭遇的希望破灭和失望太多了。不过最近西奈协定的完成标志着一个重大的进步。这是在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长久惨痛历史中第一次不因直接的战争结果而达成的协定。它可能是一个转折点。

这项协定应受在此集合的所有国家的支持，因为中东和平的进展对这里的每一个国家都有好处。这是安全理事会第 338 号 (1973) 决议所开展的过程中的又一步。不这样做便是继续僵持，这种僵持经过一段时候，将会引起另一场战争，严重威胁世界和平，并可能引起广泛的全球经济混乱。

无论是对将来的恐惧或自尊自傲都不应把事实混淆，即现在存有一个为一切问题取得进一步进展的难得机会。但机会必须抓住，否则就会失去。我要强调一点，美国并不是为结束和平的过程，而是为了对它给予新的推动而帮助谈判这项协定。

福特总统说过，我们不容许中东僵持下去。这在西奈协定签字以前是如此；现在还是如此。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制造另一个暂时的停战，而是要保持谈判的动量。美国决心采取一切可行的步骤，来帮助促进更多的实际进展，以求取最后的和平。

作为第一步，必须根据所拟定的条款和日程，尽善尽美地执行西奈协定。

在这样造成的改善气氛之下，美国亟愿应有关各方的要求，参加任何为取得和平所作的有希望的提议。

我们已明白表示，我们准备作出认真的努力，鼓励叙利亚和以色列进行谈判。

我们并计划在最近几周里与一切有关方面协商重开在较早的一个重要阶段召开过的日内瓦会议。我国与苏联是日内瓦会议的共同主席，因此我们两国对此具有特殊的责任。

我们也准备探索召开一个或许是比较非正式的多边会议的可能性，以便评估局势并讨论将来的问题。

美国不求特殊的利益；我们不想排除任何国家。我们将与任何愿提供贡献的国家合作。我们不对任一程序抱有偏爱。我们支持任何看起来最有希望的程序。我们的作法将仍然是既有伸缩性又有不屈不挠的决心。

必须在广大的基础上进行寻求最后和平的工作。我们已开始与苏联进行讨论，以求评估中东的当前局势，并衡量可能的外交途径，依照安全理事会第242号(1967)和338号(1973)决议实现一个公正而持久的和平。虽然我们与苏联有重大的歧异，但我们两国有相同的看法，即中东局势具有严重的危险性，部分的作法必须是彻底解决的一部分，并有助于它的进展。

本世界组织的任务仍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本组织没有其它成就，只在这个地区做到有效维持和平的任务，就已经值得了。这些头戴联合国蓝色软帽的和平士兵，作为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紧急部队、观察员部队的成员，已成为维持一九七四年的两个脱离接触协定，以及西奈协定，所不可或缺的要素。我要趁这个场合向瓦尔德海姆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向联合国驻中东维持和平特派团首席协调员西拉斯沃将军、及向来自许多国家的、在该没有敌人的部队中服务的所有男女人员致敬。

大会有关中东问题的审议也担当了一个中心的任务。他们能鼓励进展，也能加深紧张。关于程序的决定可能以对话需要以会员国普遍性为条件的认识为根据，也或者可能助长无益的、自取失败的努力，在违反《宪章》之下，歧视一个必须有它参加方能解决问题的会员国。

除非求得一个公正而持久的和平，否则中东将继续成为一个烦恼、骚乱、危险的地区。这样的和平必须满足该地区所有各方的主要关切所在和利益；其中包括领土完整、生活在和平与安全之中的权利，及巴勒斯坦人的合法利益。

在今日的中东，渴望和平的情绪是三十多年来所未有的。我们不要再使这个区域陷入另一代无益的斗争之中。相反地，让世界大家庭抓住眼前的历史性机会。中东所有人民的痛苦和勇敢渴望这个机会；世界所有人民的希望和利益也都要求这个机会。美国保证全力以赴，求取和平的更大进展。

联合国对和平过程的贡献在塞浦路斯也是不可或缺的。秘书长有责任组织该岛的维持和平部队，并助长希族与土族领袖之间的会谈。

严格地维持停火是必要的。对这一点，我们期盼各方的自制和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效率。

我们知道世界大家庭具有与我们同样的迫切感，要求恢复谈判，并要求各方表示出伸缩性和政治家的风度。岛上的现存情势不应成为永久性；迅速而公平的解决是必要的。秘书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减少歧见，不倦不怠地作出了有启发性的工作。他应该受到各方和这里每一个国家的支持。

塞浦路斯解决方法的细节要由两族自行决定。不过，为了遵照美国所充分支持的联合国各项决议，下列各原则是必不可少的：

解决办法必须确保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必须保证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自由相处，对他们自己的事务具有大的发言权；

现在的分界线不能成为永久界线。必须作出协议的领土安排，反映希族塞人的经济要求，并考虑到它的自尊；

除根据国际协定授权驻扎的外国武装部队外，其它外国武装部队必须规定撤离；

必须保障一切塞人的安全；难民的需要和愿望必须迅速而同情地处理，他们是主要的牺牲者，他们的遭遇引起我们大家的同情。

需要这个组织采取负责行动的另外一个地区是朝鲜半岛。

关于这一点，最重要的是保持停战协定，以待最直接有关的各方做出新的安排来接替它。现有的停战协定是各方承诺保持和平的唯一法律文书。这个结构制作严谨，足可用来监视和警备军事分界线。

联合国军司令是这个协定的签字者。主管停战协定的机构每天都在进行作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签署者否认过协定的效力。事实上这样做也不行，因为它会严重地危害到世界和平。

自从一九七二年以来，朝鲜南方和北方都提出保证，要开始对话，并以非武力方式谋求统一。本大会在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对于这个进程曾加以鼓励——首先是在一个共同意见的决议里支持双方会谈；其后又在一个决议里为结束联合国军司令部做了准备。美国同意，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的二十年，现在是应该结束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时候了。事实上，我们和另外国家为了这个目的已经共同起草了一个决议，各位现在已经收到了。

不过，如果贸然地结束了联合国军司令部而不作新的安排来维持停战协定的完整，那就未免令人觉得莽撞。为了和平，任何不能使停战协定继续有效的解决办法都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

大韩民国和美国都已经说过，它们大体愿意与对方的代表和安全理事会的其他成员会谈，来讨论结束联合国军司令部而同时维持停战协定的问题。

今天我可以说得再具体一点。美国和大韩民国期待有一天朝鲜问题会获得永久性的解决，因此在这里向停战协定签字各方提议召开一个会议，来讨论维持停战协定的方式。在这种会议里，我们也愿意探讨减少朝鲜半岛紧张的其他措施，包括能否召开一次扩大会议，来谈判一个更基本的安排。

对于这个机构来说，开门接受两个朝鲜政府做为正式会员国，正好符合这种对话的精神。美国支持朝鲜南方和北方在不妨害它们最后统一的情形之下，双双加入联合国。就我们来说，如果北朝鲜和它的同盟国愿意设法改善它们与大韩民国

之间的关系，我们也愿采取类似的回应行动。当然，任何为朝鲜半岛的安全安排而做的提议，如果有意不让大韩民国参加讨论，美国是不能接受的。

如果联合国支持一个负责任的解决方式，就可以为朝鲜半岛上的和平进程做出重大的贡献。

以往这一年里，美国对于在南部非洲达到和平解决办法方面的各种努力，一直密切注意，并寄以极大的同情。

黑人和白人非洲领袖都在设法避免罗得西亚境内的暴力和流血，都在设法促进谈判解决，我们欢迎他们在这方面所做的政治家风度的努力。该国两族之间的分歧虽然很大，但在以往十年内已经减小很多了。罗得西亚双方面和罗得西亚的黑白邻国为了本身的利益，都应该想法避免内战。我们支持所有可以获得和平解决办法的努力。

在强调我们在南部非洲和平改变方面的目标的时候，我要着重指出及早在纳米比亚获得解决办法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我国政府反对南非继续占领纳米比亚，唾弃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美国一直不断地把我们在这件事上的立场通知南非。我们会继续这样做下去。

我们相信，纳米比亚人民应该在短期之内获得机会，自由地在联合国监督之下对自己国家的政治前途和宪法结构表示意见。

倘若对军备竞赛不加控制，终而完全结束，世界和平将是脆弱的、单薄的。就是为了这个理由，美国同苏联就限制战略性武器进行了艰难复杂的谈判。我们的目标是：防止战略性军备方面无抑制的、扰乱稳定的竞争；达成这些军备的裁减；进一步减少在危机中作出草率决定的可能性；减轻核子军备竞赛的经济负荷。

去年秋天的海参威协定标志着达成这些目标的一个主要步骤。当原则上的协议变成条约时，对战略武力的水平将会订下双方同意的为期十年的最高限度。这个史无前例的步骤将会减低新军备方案的步伐，特别是那些因惧怕对方的重要部署而推动的方案。

美国正积极从事其他限制军备的谈判。我们同苏联在朝向建立一个和平核爆炸制度方面取得了进展。我们已同意对核武器的地下试爆作出限制。这些都是引向可检验的全面试爆禁约的重要步骤。

此外，美国和苏联已向裁军委员会会议提出了一件《禁止在军事上或为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技术的公约》草案。滥用这种知识可能会带来新的军事竞争，并对人类造成不可名状的无法挽回的祸害。我们敦促裁军委员会会议迅速完成它的审议工作。

另一件紧急任务是大量减低目前在世界各处严阵相对的军力水平。美国相信，重新推动中欧均衡裁军谈判的时候已经来到。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意义，很重要地取决于我们能否在这一领域取得进展。一个增进中欧共同安全的协定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我们将为这一目标而努力。

世界正面对着有关核能扩散的难题。人类制作了可以在顷刻之间毁灭千百年文明的核子武器。同时，核子正迅速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能源。很明显地，石油和其他矿物燃料的价格和最后的短缺，将会在今后几十年间使核能力散布到全世界。

但核能力的散布清清楚楚地产生了扩散核武器能力的危险——以及核物质被盗窃，恐怖主义分子的勒索，意外事件，或者在区域性政治冲突中施加核威胁等等有关连的危机。目前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如果我们不能限制核扩散，未来的世代将会在核浩劫阴影笼罩下生活。

过去一年，美国屡次敦促各供应国作出新的努力，对输出核物质的安全保障和管制加以强化和标准化。我们决不能让商业上的竞争来损害这些安全保障。我们必须确保核能在安全、经济和可靠的条件下广泛地提供和平使用。

美国已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内和其他国家加紧努力，以谋推广和加强国际标准和安全保障，并已提议订立一件国际公约，来对使用、储存或转运中的核物质的安全保障规定标准。

美国继续促请尽最大可能普遍遵守不扩散条约以及原子能机构的各项有关的安全保障措施。

漫无控制的核扩散的最大的单一危险，在于国家管理下核能工厂核物质再加工设施的散布。因此美国建议——作为加强所有其他措施的一个重要步骤——设置多国家区域性核燃料循环中心。这些中心将在商业上健全的基础上供应能源方面的需要和鼓励区域性的能源合作。它们的存在将减少设立小型和低效率的再加工设施的诱因；限制把和平核物质转移到国家军事用途的可能性；创造一个有效地应用国际安全保障的更好的架构。

我们敦促各国家集团现在就开始探讨这一概念，并敦促所有国家支持原子能机构在这一领域的工作。

在过去两年中，国际社会戏剧性地被提醒经济关系在何种程度上是经济秩序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如果在我们舍弃了冷战时代的紧张关系的时候我们要进入一个南北之间和贫富之间的冲突的新时期，这将是历史上最带悲剧性的讽刺之一。在最近结束的特别会议上，美国呼吁结束过去的徒劳无益的对抗局面。我们指出，当人类的古代梦想——一个没有贫穷的世界——成为一个可能性时，我们的道德信念也使它成为一项义务。我们并强调，只有合作——不是勒索——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特别会议使我们有理由希望——至少在最接近的将来——大家已经决定从对抗转向合作。美国以支持最后文件为荣，它是本会议厅内许多人的辛勤工作和专心致力的成果。

美国把特别会议的成就看作一个开始，而不是一个结束。如最后报告所建议的，我们现在必须向前迈进，在可资利用的场合把我们已经同意的目标付诸实现和给予具体内容。在今后艰难的谈判中，我国政府将以合作与和解的精神，积极地参加。

除了和平、安全、繁荣之外还存在着更深刻的希求尊严和机会平等的普遍愿望。人类永远无法避免随着生死周期俱来的一切悲剧。可是，要解除或减轻社会性悲剧和不公正的制度所造成的负累，却的确是我们力所能及的。

因此，美国一向鼓倡在国际事务方面扩大国际法的范围。我们帮助疾病和天灾的受害者。把国际人权列入国际外交的议程，已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国际法的范围必须扩展到这个星球的最后领域——海洋。海洋是人类共同遗产，但是如果不用法律加以管制，它们就会变成冲突的舞台。它们蕴藏着尚未开采的能源、矿物和蛋白质；它们对环境上的完整是我们的生存所维系。

美国欢迎联合国授权缔结一项管制使用海洋及海洋资源的全面性条约。上个月我在蒙特利尔阐述了我们对这个谈判的看法，并且极力主张明年的海洋法会议能够迅速进展，圆满结束。以这个世界长期的政治与经济稳定和繁荣而论，没有任何国际谈判比这种谈判更息息相关的了。

国际法也必须正视国际恐怖主义的问题。由于缺乏明确规定防止非法而危险地干预民航的国际上共同接受的标准，结果丧失了无数的无辜生命。为了假定的政治利益而劫持飞机、绑架和谋害无辜的平民受害者，仍然是文明的人类所遭受的灾难。这仍然是国际法中有欠发展的领域之一，值得本组织给以最紧急的关注。

对人类的同情心要求我们调动国际资源，克服由来已久的人类灾祸——疾病、饥荒、天灾。

崇高的人权必须受到承认、尊重，并使之成为国际事务中的现实。最早的若干联合国宣言以及最近的赫尔辛基会议，都明确地显示了这些都是国际关切的事项。美国将支持这些原则。在世界每一角落，在所有各大洲，不论是一个种族损害另一种族的人权，或同一种族中成员的人权受到损害，凡是对人权的侵犯都必须加以反对；不论种族、性别或宗教信仰，对人权必须加以珍视。我们决不容双重标准。

在个人提出了严重而可靠控诉的若干事件中，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已采取了防止严重侵犯人权的初步措施。我们支持这些措施。在防止人类价值堕落的战斗中，国际大家庭的一致关切可以成为有力的武器。

最持久而严重的问题之一是酷刑，这是所有国家都鄙视的作风。当政府的庞大权力不是用于服务人民的利益，而是用来作为造成人民痛苦的工具时，这是政府职权绝对堕弛的表现。

美国敦促本届大会通过最近在日内瓦召开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世界大会的宣言。此外，我们建议本届大会设立一个由秘书长任命的专家小组，来研究目前世界上酷刑的性质和程度，并向下一届大会提出报告。

本组织的创设是本着人类的共同性可以反映于国际事务的处理方式这个信念。这个会议厅象征着人类的希望，即人类对于各国为了共同利益、凭着理性、责任心、相互尊重、一道努力时所发生的威力所寄予的希望。

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复杂的，危险的。昨天的无益口号，过去的解决办法，以及念念不忘陈恨旧怨，只有扩大我们之间的距离，并使和平以及各国人民的福利所面临的危险日益增长。

我们有能力向后代证明，二十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不是一个暴乱和冲突的时代，而是一个世界史上的创造时代。

我国的历史昭示我们：一方面促成团结，同时珍惜多样性，是做得到的；尽管我们在这个会议厅里看到各种不同的种族、利益和信仰，采取一致的行动是可能的。进步、和平、正义是可以获得的。

因此，我们向各国人民和政府呼吁：让我们一道建造一个崭新的世界秩序；这个新秩序要公正合理；让新兴的国家帮助建造这个秩序，它们要觉得这个秩序是它们自己的；让老的国家利用它们的力量和技术来促进全人类的利益；让我们大家在一起，为使精神生活丰富，为使人类品质升级而共同努力。

蒙铁尔·阿圭略先生（尼加拉瓜）：主席先生，首先请让我在对你的当选第三十届联大主席高职所已表示过的那些祝贺上面，再加上我国代表团和我自己的热烈祝贺。你的当选是对你的杰出资格的一种极为正当的承认，也是对你所代表的那个勤勉工作、高度文明的国家的一个敬礼。

依照宪法以总统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德瓦伊莱将军为首的尼加拉瓜政府和尼加拉瓜人民，不能不对这件有意义的事表达他们的喜悦，我带给你他们的祝贺。我们深信你的智慧和经验将帮助你领导我们的审议，预兆本届大会的成功。

我也愿向你的前任，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先生致敬，他在大会的第二十九届常会和第七届特别会议期间工作优异。

我恭敬地请求你，主席先生，向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转达我们的祝贺。他对他重要职位的复杂任务所作的努力，我们给予了深切的注意和高度的赞赏。

三十年前，在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有五十一个国家的代表在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签订了本组织的宪章。那时，正当一场由于轴心国的野心所造成的摧残自由世界的战争，由于轴心国在五月间受到盟军解放武力的进一步痛击而结束了战争之际。尼加拉瓜很自豪它是宪章的签字国之一，它的代表团签署了它，并出席了大会的每个常会和特别会议。

现在当联合国庆祝成立三十周年之际，我们欢迎莫桑比克、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加入，并向它们的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

一个个独立国家的出现是历史的一个特征，这个特征现在又出现了，因为本世纪里非洲人民为反抗殖民主义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战争——在这一场斗争中，联合国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们的组织在肩负起它调和与促进各国人民发展愿望的全球性责任方面是没有其它组织可以相比的。在它成功的同时，它还达成了宪章第一条所标列的另外三个目标：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发展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关系；促成国际合作，以解

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或人道性质的国际问题。

从联合国的工作中证明，当今的国际社会要求象我们这样的组织有新的目标和新的活动。

国际的和平及安全，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及合作，是不能靠歧视来达到的。会籍普遍性不应只是演讲时使用的字眼。它应加以有效地实践。我们必须向各国人民保证，凡是一个国家，并满足了宪章的要求，就得接纳为联合国的正式会员，没有例外。

局势的演变和国与国间的关系证明，在力量和影响方面，有些国家比别国较为脆弱。国际秩序及其管理机构必须要有更合理的基础。因此，假如联合国要充分实现它的传统目标，则它除了要具有全球性外，还必须是国际法的一个有效而正式的根源，以及成为旨在为各国人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倡议和行动的一个中心。尼加拉瓜代表团的行动正是建筑在本组织的目标和原则的这个基本观念的基础上。

联合国的三十周年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来想一下以后的岁月。评断一个历史时期只凭那个时期内发生的事件，特别是判断的时期很短，而所发生的事件又是较早发展的后果，是不合理的。

我不认为我们能说国际社会的所作所为完全令人满意——我后面将说明——并且，不可否认的，本组织必须大加改革，这项改革应从最基本做起。

我相信第七届特别会议是朝向这个目标的一个重大步骤，因为它把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的进程继续下去，并且成立了一个各国都可参加的特设委员会，以推动联合国系统在国际合作和发展方面的改组。因此，它在第3172(XXVIII)号和第3343(XXIX)号决议；关于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大会这些年来来的成就上，又加上了一个里程碑。

现在不是一个适当的时间或地点来详细分析第七届特别会议的结果，这件工作要在各主要委员会一级来进行。请让我简单地回顾在特别会议期间尼加拉瓜代表团团长的发言：

“我国代表团相信，特设委员会为进行审议、讨论、磋商所定的方法，将导致适当的结果。”（第二三四五次会议，英文本第17页）

正是该次会议设立的特设委员会编写了一个新文件，经共同意见通过。

现在轮到各国政府来解释那些目的、执行那些计划、达成那些目标；认识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要素就是合作；并为了配合各国的发展努力而革新国际机构的组织；了解到这个秩序的目的是全球性的，在发展的继续过程中不应提供谋求新利润的机会，而是要形成一个道义上的承担，旨在按部就班地消除存在世界各国之间的不平等。

从上面，我们体认到，联合国的结构改组必须包括改革它的法律基础。自从一开始进行这件工作以来，尼加拉瓜就一直赞成并支持这种努力。

本届会议的议程很长，包括许多重要项目。在宪章和实务所加于联合国的责任中，包括了各式各样对影响到个人与国家问题的反应。对问题和所达成的解决方式的想法不是一致的，而意见的分歧和调和分歧意见的需要都指出了对话的价值。我将大胆地表示一些尼加拉瓜认为重要的具体意见。*

中东危机离开解决还很远，虽然我们极为满意地欢迎埃及和以色列本月内达成的协定。同样的意见也可用在塞浦路斯危机上面。在减少大国之间的武装冲突上面没有什么重大进展，核战的危险仍然不祥地笼罩着整个人类。越来越多的小国涌向购置军火，其结果是两面的，一方面迟缓了它们的经济的发展，一方面酝酿新的紧张和危机。最近东南亚的事件的余波震荡到朝鲜，导致北方和南方的紧张的增加。

也许可以说，唯一的一线曙光便是在赫尔辛基举行的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我们深信在寻求改善关系的新形式和消除国际紧张局势上，它代表重要的一步，但有一个条件，便是要真心诚意地把协定的文字和精神付诸实践。

* 哈利法先生（巴林），副主席，代理了主席就座。

让我多谈一下朝鲜问题，因为我国代表团连同世界许多地区的各国代表团，共同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即将送交大会审议。我们相信解决的方法在于北方与南方之间通过谈判进行朝鲜的和平统一，应鼓励有关各方举行这种谈判，使得有可能在保持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停战协定的效力下解散联合国司令部。前述作法是去年所通过的第3333(XXIX)号决议的一个合理的发展，也是朝向在世界上这个重要地区取得和平与安全的一个积极步骤。

在美洲各国方面，我们继续进行改组我们的区域组织的工作，这个组织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章中所列区域协定的标准而成立的，并在一个多月前举行了一次会议，修订了一九四七年的里约热内卢条约，使它在关于维持美洲大陆和平与安全方面能适合于现在的一般情况。我国政府认为必须把恐怖和暴力的紧张情势一劳永逸地代之以积极的对话和民主、自由的气氛。虽然我国政府一贯对各国人民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保持积极的态度，但也一直深信，任何为了妥协、和平而采取的措施或愿望都不能阻止对一个民主国家的首要职责的遵守，这就是有力地谴责一切恐怖主义和暴力的运动。

第三届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在今年三月到五月举行。会议起草了一项单一文件，这个文件应作为谈判的基础。

我国代表团特别重视参加本届大会的各国代表团间的非正式协商，因为这种协商会促进将于明年三月举行的第四届海洋法会议的工作。尼加拉瓜特别有兴趣参加这些谈判，并真诚地希望该次会议成功，从面对海洋法作出调整使适应当前时代的情况，同时也消除一个尖锐的争议和国际冲突的根源，这个冲突毫无疑问会发生，除非找到一个解决方法，能够一方面在重要的利益冲突之间取得协调，一方面也不忽视取得一个更平等的国际秩序的需要，使这个新秩序放弃那些不合时宜的学说，并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愿望，因为它们来说，海洋是它们全面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

依照三年前的协议，把一九七五年宣布为国际妇女年，这个方案的高潮便是今

年六月在墨西哥举行的世界会议。

我们认为在尊重人的尊严上，包括了要取得男女之间的平等，并且要把数世纪来阻碍这种平等有效实行的那些法律和习俗的障碍加以清除，使我们能拥有一个公正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妇女的有益影响可以在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里表现出来。因此，我国代表团将支持任何旨在对该世界会议的各项有关决议给予实际效果的提议。

在重复我们对土耳其的最近一次地震灾害所表示的慰问的同时，请允许我就自然灾害问题表示一些意见。

尼加拉瓜作为一个因为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地震对我国首都城市的破坏而接受了本组织援助的国家，我们对发展中国家在自然灾害情形下收到国际援助的重要性有深刻的体会。

我们相信要使这些援助更为有效，就应该加强联合国灾难救济专员办事处，并且应该把支出费用计算到联合国的经常预算中去。

假如不这样做，则关于基金有无的不确定情形及自愿捐助者可能对基金的使用施加政治压力的情形，都将继续下去。此外，方案的基本指导原则应该主要源自由于种种地理上的原因或由于它们的发展程度而最可能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的那些国家。

虽然我在发言开头就我国对经济和社会问题所采取的立场作了一般地简介，我还愿就我国政府特别重视的一些项目特别说一说。

我国对关于粮食方面的国际合作特别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居民仍然感到粮食短缺，而粮食生产仍然集中在发达国家。对由于旱灾或其它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短缺，可接受的解决方法是对受灾国家提供粮食，但对经常的短缺的唯一长期解决方法便是一面促进粮食的生产，一面改进资金供应、生产、贮存的程序。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从而达到世界的粮食安全，则国际合作、提供资金、转让

技术都是不可或缺的，方能扩大耕地和灌溉地的面积，购置农业机械，使用杀虫剂和肥料。

我们有联合国特别基金理事会的报告，基金的工作，根据我们的看法，需要加以审议和改革。我们认为应该对用来决定哪些国家是最受到国际经济危机影响的那些标准进行审查。应该使用一组更有意义的经济参数来实际地、更准确地反映目前国际危机所造成的害处。否则，那些原有着严重经济困难，又加上经济危机打击的国家的贫困情形将会增加。这些国家看到它们的选择由于那些限制性的标准而大大地受到局限或减少，从而导致它们人民的发展的减慢。

基于我刚才所说的关于灾难救济专员办事处的同样的理由，我国代表团认为特别基金的行政和财政支出应计算在联合国经常预算里，而不经由自愿捐助来支付。

我国政府在重申发展的道德的这一观念的同时，并不忽略在新结构和方案中应具有客观态度、实用主义和高瞻远瞩。我们真诚地相信资本和劳动是互相刺激的，这是我国私有财产和自由企业经济制度的基础。

我们也深信在管理资源上应当使用效率和效果的原则，是决定承担工作程度的最有用的标准：这一切都是因为应该把促进发展的主要动力指向福利和平等的道德基础。

曼顿古·布拉·尼亚蒂先生（扎伊尔）：主席先生，就你众望所归的当选为我们组织的大会第三十届会议主席，请让我要求你不要客气地接受我谨代表扎伊尔共和国总统、人民革命运动的主席和创建者，蒙博托·塞塞·塞科·库库·恩关杜·瓦·扎·邦加总统，以及代表人民革命运动的全体扎伊尔人民，向你表示的真诚祝贺。

你是贵国的一位有经验的政治领导，又是一位各国和平共处的热烈鼓吹者，因此你为国际社会作出了非凡的服务。今天，轮到国际社会向你全心全意地致敬，

请你来主持大会第三十届会议的工作，这次大会是紧接在重要而历史性的专门讨论发展和国际合作问题的第七届特别联大之后召开的。

主席先生，你的学问和品德已使你成为一个世界公认的政治家，我确信，它也能使你帮助大会对我们非常繁重的议程上所列的许许多多难以处理的问题找到一个恰当的共同意见。

我愿趁这个机会，阁下，加入在我之前的发言者，向你的前任，阿尔及利亚人民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先生阁下表达我们的祝贺，他卓越地领导了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和第七届特别会议的工作。

我如没有向我们组织的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表示他受之无愧的敬礼，就太粗心大意了。秘书长为了维护我们全体所支持的那些伟大的人道原则而作了不懈的努力，这些原则更表现在联合国宪章中，构成以全球和全世界为基础的国际合作和人类正义的纲要。

请让我在大会上带着某种程度的感情来回忆一下在一九七三年的十月四日，扎伊尔共和国总统，人民革命运动的主席和创建者，公民蒙博托·塞塞·塞科在这同一的讲坛上谴责了富国对穷国所犯的非正义行为，因为一边拥有了所有的发言权而另一边则毫无发言权。

他作出这个勇敢的谴责后，在结束他那篇等于是一个国际和平与合作宪章的光辉讲词时，表示了希望，希望通过联合国，我们能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各个领域里较好地促进我们地球上人类的合作，从而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伸张正义和平等，并绝对地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立。

今天，扎伊尔代表团感激地看到在经历了第六届特别会议，特别是经历了刚刚完成任务的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后，我们组织明确地表示决心“……消除折磨广大人类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并加速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A/AC.176/L.3）。

经历了时常出现困难但总是充满相互了解的气氛的种种辩论以后，我们组织的

全体会员国终于赞成了建立一个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原则，其基础已订立在宣言和行动纲领，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之中。

在我们组织第七届特别会议的工作中，看到了工业化国家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集团为了结束现今存在这两个集团间的不均衡情况而采取了一致的行动。这样，国际间的团结将比过去有了更实际的形式。

除了希望我们地球上的全体人类有一个较好的前途——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点燃了希望——以外，并且清楚地表明它为全世界带来了一个新的现实，世界现在分为两个集团：首先是“有的”或工业化国家，另一方面是“没有的”或发展中国家。有些人甚至宁可就称他们为富国和穷国。

我们不要纯粹在文字上打转，还不如面对残酷的现实，正如人民革命运动的主席及创建者，公民蒙博托·塞塞·塞科一九七三年十月四日在联合国演讲时所强调的，这个残酷的现实意味着我们的世界“……不再被意识形态所划分，甚至也不是被种族或政治地理划分，而是依经济来划分了……”（A/PV. 2140, 第71页）。

在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的工作期间，我们看到了这种划分在两个十分不同的主要集团间所展开的讨论中鲜明地表示出来：首先是七十七国集团，即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是工业化国家，它们又区分为两个次集团，即西方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

当今世界的新现实显然要求把旧的陈腐论点改变过来，这些论点是地缘政治理论的特征，是不论左或右的工业化世界所一直想强加给我们的。

这种改变对发展中国家特别不可或缺，他们必须了解到作为他们全体特征的发展不足和贫穷情况也必定促使他们首先要彼此合作，并使他们与工业化国家间的关系更和睦。

这种改变对工业化国家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他们必须因而了解到，对我们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的发展水平，以及他们的密切合作——这种合作总是通过两个主要集团所达成的种种协议来进行的——都向我们证明了，在我们看来，他们都似

乎是一样的富裕。让我们首先不要忘记，贫穷只有相对于富裕才具有意义，也不要忘记富裕总是只附属于工业化国家的东西。

正是由于这种鲜明的现实才使得发展中国家了解到它们的情况，和了解到为缩短富国和穷国之间差距所做的努力，不是针对一部分的工业化国家，而是要针对全体工业化国家，无一例外。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发扬了富国和穷国不分彼此，一致行动的概念，从而肯定了扎伊尔所主张的既不偏右，也不偏左，甚至不偏中间的积极中立主义政策。扎伊尔希望在与一切国家的关系上真正地保持自立。事实上，由于直接同一切工业化国家没有分别地交往，以及直接处理发展不足的问题，使得穷国承认了它们现在必须不考虑意识形态的不同而与一切富国接触。同时富国也由于同意了把穷国看做为一个单独集团的成员来谈判，从而承认解决发展不足问题是国际团结的必要部分，而不是什么与意识形态冲突有关的东西。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所标志的精神是朝向国际合作和世界和平事业迈进的重要一步。不论怎么说，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虽然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的精神继续在彼此关系上激励着我们组织内的一切会员国，但我们可以不怕被误会的说，冷战已经被永远地判为非法，不仅在大国间为非法，并且在全世界各处都是非法的。因为那些大国已不再需要在各国间找寻顾客；相反地，它们将依照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期间，富国和穷国一起制定的那些建议，共同工作，以协助缺乏资本设备的那些国家。

现在既已为国际团结下了定义，接着便是要由穷国自己作出严肃的努力以解决它们的发展问题。为了要这样做，它们必须保持真正的独立自主，才能产生必要的政治决心，以实现国家的、各洲的、以及洲际间的发展，这些发展首要地应当考虑到它们人民的利益。日增的这种独立自主精神是我们政治计划的特征，它现在将使我们真正地控制我们的自然资源成为可能。它将能使我们可以培养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加强我们与工业化国家的关系，不论这些工业化国家是偏左或偏右。

能力不足国家对世界危机的严重后果所体会到的前所未有的尖锐感觉必须作为

一种经验、一种刺激，用以实现被称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各国的积极团结。在扎伊尔这方面，它坚定地相信这种团结，并强烈地希望这种团结将立即在洲的一级建立起来，然后在洲际的一级上建立起来。

为了使这种团结能在非洲大陆成为事实，扎伊尔已决定，在与其他非洲国家贸易的领域里，接受这些国家的货币作为付款。这个步骤无疑地将使我们人民和非洲其它各国人民对自己的国家货币产生信心。因此我们将停止以美元、法国法郎、英镑、马克等等作为思考单位了。非洲国家间贸易的发展，以及所导致的非洲经济的发展，无疑地将使得非洲货币具有兑换性。

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必须及于努力的一切方面。这种团结显然必须是我们的每一个国家在国家内和区域内所从事的发展努力的成果。为了达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必须依赖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我们所面对的发展问题。普遍存在我们许多国家中的饥饿情形只有当我们的人口能够生产自己的口粮时才会终于消失。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外援的好处，但扎伊尔坚信一个国家必须自己努力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这就是“劳动”政策，它在扎伊尔采取的形式便是发动人民，改善工农业的生产。通过“劳动”政策，作为扎伊尔主要优先项目的农业将在现在到一九八〇年间发展到一个程度，使得那时我国将在粮食供应上取得独立自主。

显然的，一个独立的发展政策必须包含我们国家对我们自然资源的主权。并且，这也完全符合《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精神。

扎伊尔在这方面的经验清楚地指出，自然资源的主权在外国投资者与我们自身之间创造了最好的合作条件。事实上，自从“扎伊尔化”以后，扎伊尔国才能够向西方或东方的外国投资者提供不仅有利的条件，还提供合理的保证。并且，也是最最重要的，在“扎伊尔化”以后，任何在扎伊尔根据我们的投资条例投资的外国人可以免费得到土地，在这土地上建立他的企业。在土地国有的扎伊尔境内，任何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可以免费得到他商业或工业企业用途所需的土地，这在“扎伊尔化”以前是不可能的。

现在我们组织的全体会员国既已把联合国作为真正国际团结的焦点，扎伊尔欢迎富国和穷国双方为缩短存在它们之间的主要差距所显示的决心。法国政府不久前决定在十月十五日召开的初级商品生产国和消费国巴黎会议无疑地将是对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刚刚支持的国际团结作出了一个具体的表示。

扎伊尔要十分清楚地表示，它赞成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合作；因此它反对对抗。

人民革命运动的创建者、扎伊尔共和国总统、公民蒙博托，塞塞·塞科于一九七三年十月四日在这个讲坛上演讲时，就非洲的被殖民国家问题说道：

“今天，当我们取得了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时，我们还是不能在我们自己家里感到快乐，因为我们在安哥拉、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南非、纳米比亚的那些兄弟仍在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罗得西亚的英国移殖者、南非的种族主义者等的桎梏下挣扎求生……因此扎伊尔有一个不可逃避的政治责任，要对仍然遭受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的一切邻国给予物质和军事的捐助。”（第二一四〇次会议，第58—60页）。

今天，这些国家中有几个已经独立，并且现在已成为本组织的会员国，这个事实是扎伊尔所真诚欢迎的。我们向我们的兄弟姐妹，莫桑比克、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代表，为他们各国人民战胜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胜利，表示真诚的祝贺。我加入在我前面的发言者欢迎他们到我们中间来。

我们也对柬埔寨王国政府的代表理所当然地回到我们行列中来表示欢迎，它的英勇人民刚刚重新取得了他们的民族独立。

我们这个已经存在三十年的组织现在正通过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显然必须就其结构作出一个修改。本组织已经在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期间认为需要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因为这是使我们这个世界适应我们时代的要求的唯一道路，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内部不作出改变是很困难的。

联合国的大多数会员国都认识到世界局势与当初联合国在旧金山成立时的局势已不相同。并且，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也在他的一件报告中，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这个普遍的看法。他说：

“战后世界的演变包括：核武器的出现、区域军事同盟的形成、非殖民化的加速发展、应用科技的惊人发展、人口的剧增、和大批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出现，这种演变在过去三十年中造了新的地缘政治结构。因此，全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基础所起的剧烈变化，是旧金山当时所未能预见的。”（A/10001/Add. 1, 第1页）

我们几乎不需要去回顾或详细讲述关于联合国在一九四五年成立时只有五十个成立国的这个事实。他们当年战败纳粹，才刚刚终止了一场世界浩劫，但余悸犹在，因此他们差不多把我们的组织变成了一种神圣同盟，正如同欧洲在另一个时期在一个我们现在所一致痛恨的非常相似的浩劫之后所出现的那个同盟。现在联合国已有一百四十多个会员国，我们岂不是很显然而恰当地应该把我们组织变成一个致力国际团结的真正机构，在这个机构里不存在大国或小国，大家都是国家。

就和平事业来讲，我们承认我们组织的价值。扎伊尔是很有资格这样说的。我国将决不会忘记联合国对当时正陷入严重内部问题的扎伊尔——那时称为刚果——所作的恢复和平的努力。我们仍为这件事而感激联合国。

但是我们相信新的历史情况要求我们的组织适应这种演变。因此就这一点我们愿重申我国总统在这同一个大厅里所表示的立场。因此扎伊尔建议“修改联合国宪章，使它适应现在的世界局势，特别考虑到非洲大陆的代表问题，并考虑到一个事实，即昨日的战败国已变为今天的大国了，因此我们组织的决定应受到一切会员国的遵行，不得有分别，也不应成为一纸具文。”（第二一四〇次会议，第82页）

假如我们特别坚持要我们组织适应世界的现势，那是因为我们所继续给予它的信任，鼓励着我们要尝试使它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实现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特别是第七届特别会议所述的国际团结这件任务上切实有效。

从越南和柬埔寨的事件，以及中东的那些事件中，充分地证明了联合国在为那些地区恢复和平上，没有能力起积极而有效的作用。

在越南、在柬埔寨，必须人民有决心，必须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不懈的支持，才能使那些国家恢复它们的独立。

扎伊尔愿趁这个机会为越南和柬埔寨两国人民打败帝国主义所取得的胜利欢呼。对扎伊尔人民来说，这场胜利也是一场真正自立的胜利。越南人和柬埔寨人希望保持自己的特性，并且证明了“每一民族都能够依照它自己的习惯和风俗来生活、自治、发展和繁荣，这是符合它自己的真正特性的。”

虽然独立与和平已回到了越南和柬埔寨，但还没有回到巴勒斯坦、津巴布韦、南非或纳米比亚。在那些国家里，种族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拒绝给予它们的居民以自决和建立家园的权利。

因此，扎伊尔毫无保留地谴责以色列为压迫巴勒斯坦人民所推行的政策。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扎伊尔与它有着极好的关系——所代表的巴勒斯坦人民可以永远信任我们的支持。

津巴布韦的白人移殖者所推行的种族主义政策，以及南非和纳米比亚的白人少数所采用的种族隔离作法，扎伊尔是毫无保留地反对，它将对那些国家中进行民族独立斗争的兄弟人民给予百分之百的支持。

我们组织有必要继续对比勒陀利亚的少数政权施加压力，强迫它承认纳米比亚人民应享有它们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权利。

扎伊尔愿趁这个机会对法国表示感谢，因为它的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先生在最近到扎伊尔作正式访问期间，宣布了他的政府的决定，下令禁止出售武器给南非。我们大胆地希望法国这一个谴责种族隔离政策的例子将为其它大国所效法；这将迫使比勒陀利亚的少数政权尊重联合国的各项有关决议。

我们对津巴布韦的伊恩·史密斯的种族主义政策和南非、纳米比亚的种族隔离

政策所做的毫无保留的谴责，绝不应认为是意味着扎伊尔赞成把这些白人少数赶到海里去。扎伊尔所坚持的，只是要津巴布韦和南非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尊重多数治理的原则，照顾到该地区一切居民的利益——不论是黑人或白人。

关于中东的局势，扎伊尔的立场早在一九七三年十月四日就由人民革命运动的主席和创建者，我们共和国的总统，公民蒙博托·塞塞·塞科在这个讲坛上清楚地表示过了，这个立场仍然没有改变。请让我提醒诸位我国总统那时所说的话如下：“扎伊尔现在已经到了必须作出选择的时刻，必须消除一切误解，必须排除由于它的非洲天职而造成的某种暧昧。因此，扎伊尔必须在一个友好的国家，以色列，和一个兄弟的国家，埃及，之间作出选择。但是在一个朋友和一个兄弟之间的选择是很清楚的，并且我们的决定是完全由我们自己作出，不受一切压力的影响。

因此，根据扎伊尔共和国宪法第二十四条所赋予我的权利，我向全世界宣布同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直到埃及和其它有关的阿拉伯国家收回它们目前被占领的领土为止。”（第二一四〇次会议，第62—63页）

由于埃及和其它阿拉伯国家的一部分领土仍然被以色列占领，因此，扎伊尔关于和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的立场仍然不变。

安哥拉目前的局势无疑地使非洲各国，特别是扎伊尔感到不安，它与该国有2,6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扎伊尔一直支持并仍在支持安哥拉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它将象一九七五年六月一日与葡萄牙政府签订金沙萨协定以来一样的作法，继续严守中立，尊重三个独立运动。

由于葡萄牙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以前将仍旧负责安哥拉的行政和安全，因此我们深信葡萄牙政治局势的稳定才能使它采取必要步骤，恢复其殖民地的和平。这样才能使三个解放运动赞成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使他们能在和平情况下取得民族独立。

扎伊尔极为尊敬国际法律和正义的原则，这些原则是我们全体都接受的，也正是联合国宪章的目标。因此，全体会员国所支持和维护的各国人民自决的权利，

不应依照某些国际小集团所承认的或不承认的利益而有差别的加以应用，即使这些国际小集团假冒为进步份子。

因此就卡宾达而言，这是葡萄牙管理下的一块领土，与安哥拉之间隔着一个扎伊尔，我国要向葡萄牙政府呼吁，要求它给予卡宾达人民以自决的权利。葡萄牙关于这件事的积极态度将为保障该地区的和平作出重要贡献——这一地区已经因为冲突而受到摧残，其结果还在未知之数。

因此扎伊尔愿重申它的立场，即葡萄牙应给予卡宾达人民以自决的权利。关于这一点，为了使卡宾达人民能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前途，扎伊尔赞成由联合国或非洲统一组织主持，在卡宾达举行一次全民投票。

在与其它国家的关系上，扎伊尔与一切不仅尊重扎伊尔的自立，并且尊重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原则的那些国家维持外交关系。

在越南战争期间，扎伊尔与巴黎协定的四个签字国——即美国、北越、南越及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政府——保持了外交关系。现在印度支那的战争已经结束，我们将继续与美国、越南北方和越南南方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根据我国自力的当然逻辑，扎伊尔支持接纳越南北方和越南南方进入联合国。

谈到朝鲜问题，扎伊尔一直对这两个实体，即北方和南方，严守中立；扎伊尔认为我们组织应该采取步骤，协助双方缩短歧见。扎伊尔与北方和南方都维持着极佳的外交关系，它希望双方和平地进行统一，假如统一是它们人民的愿望的话。但是，假如朝鲜人民作出不同的决定，我们组织将必须接纳朝鲜的两个实体为会员国，这是两个德国的作法，无疑地不久也将是两个越南的作法。

关于塞浦路斯岛的局势，我们组织已牵涉在维持该岛和平的困难工作之内，扎伊尔赞成它们的民族和睦。我们向两族呼吁，通过谈判寻求能符合双方利益的和平安排。

因为一致行动已经成为所有国家在为它们之间所发生的争执寻求解决或处理的

方法时所接受的一个原则，扎伊尔认为并热切地希望这个原则将继续应用在目前进行中的关于海洋法的商谈上。

经过了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理所当然地我们组织应推动使海洋法重新纳入各种解决方法的范围内，对恢复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平衡作出贡献。

我们希望大国不要任意利用它们的技术优势和它们几乎是独有的调动大笔财政资源的能力来开采海底的矿物。我们向他们呼吁，继续尊重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的精神，并在以后的海洋法商谈中表现出与它们在第七届联大工作期间所表现的同样开明的谅解精神。

当我们想到我们的贫穷时，我们相当痛恨地注意到除了我们所遭受的经济剥削以外，我们的一切艺术品也遭受了殖民主义国家无情的、有系统的掠夺。我们珍贵的艺术品被干净俐落地掠夺了去。它们可以在工业国家的每一个大城市里找到。在东方或西方的工业国家里，没有一个享誉世界的博物馆中看不到非洲的艺术品。

我愿请我们庄严的大会注意一事实，即这些为东方和西方的工业国家里的那些人种博物馆和考古博物馆引为骄傲的非洲艺术品事实上是免费取得的。换句话说，正如公民蒙博托·塞塞·塞科总统一九七三年十月四日在联合国所说的：

“这些不花一文钱取得的东西已变得如此值钱，以致于我们中没有一个国家事实上具有物质上的能力去收回它们。”（第二一四〇次会议，第74-75页）

因此扎伊尔代表团重申它向一切工业国家——不论是西方或东方的工业国家——所作的呼吁，要了解把它们所持有的艺术品归还给财力不足国家的需要。假如这些工业国家觉得它们有权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立即收回被纳粹政权盗窃去的艺术品的话，那么常识、正义和公平都指使它们要归还给发展中国家它们的艺术品。这样子工业国家才会在加强缺乏资本设备的国家的文化财富上作出有效的贡献。

扎伊尔愿趁这个机会祝贺比利时王国的政府，它已经接受把许多在比利时博物馆里找到的我国艺术品归还的原则。目前在比利时王国与我国之间进行的为归还我国艺术品的令人兴奋的谈判无疑地将得到一个肯定的结果。我们诚恳地希望比

利时树立的这个榜样将会为其它工业国家所效法，并且希望我们组织还能在大会本届第三十届会议期间起草一个决议，为归还给发展中国家被西方和东方的许多工业国家所持有的艺术品而建立明确的程序。

由于蒙博托·塞塞·塞科将军的有作有为，扎伊尔已恢复了它的领土完整与国家安定。它的人民再度与人民革命运动团结在一起，掌握了自己的前途。哲学意味地说，扎伊尔共和国所遵循的就是我们所称为的“自立”观念。公民蒙博托·塞塞·塞科总统把它说明为：

“……扎伊尔人民了解到他们应当求自己、寻求祖先的价值，以判断何者能对他们的和谐而自然的发展作出贡献。

“扎伊尔人民不会盲目地信奉外来的思想。这是扎伊尔人，或任何人，不论他住在哪里和做什么的，对他自己文化和社会结构的一种肯定。”

扎伊尔人民认为自立精神——扎伊尔人称为蒙博托主义——是“对抗帝国主义和不正义的唯一的绝对武器”，因此扎伊尔人遵循着他们自己的结构发展进程。既不想信奉左的思想，也不想信奉右的思想，“因为在每个拐弯地方都会碰到帝国主义与剥削。”我们人民已经选择自己，换句话说，选择自立，因为他们深信“扎伊尔的问题除了由扎伊尔人民自己来解决外没有其它有效途径。”

不过，扎伊尔人民也认识到：

“自立不是狭窄的民族主义——盲目地回到过去——相反地是各国间求取和平的一个工具，是各国人民的一个生存条件，是各国互相合作的一个基础。

“因为自立不仅增加对自己文化的认识，并且也尊重别人的文化传统。”

因此我们深信唯有尊重每一国人民的自立才能使各国间的和睦关系成为可能。这将从加强我们组织的全球性，使得我们组织里具有不同社会和政治结构的每一个国家能彼此合作，有益于恢复工业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平衡，以及有益于世界和平事业。

这就是为什么对联合国会籍普遍性的特征极为尊重的扎伊尔共和国热切地要为

保持这个特征而工作。即使有些会员国——为了一些我们都不会同意的理由——目前对我们组织的各项决议作出模棱两可的解释，我们仍有责任对它们以及那些支持它们的国家施加一种压力，以迫使它们尊重联合国的建议。因此必须在联合国之内而不是在联合国之外施加这种压力。我们所必须做的是加强本组织，而不是减弱它。

因此，扎伊尔共和国作为一个原则已决定直截了当地拒绝把任何国家从任何国际组织中除名、排斥或停籍的想法。所以扎伊尔的立场是针对国家来说的，而不是针对国家的代表性。

因为我们是如此地关切加强联合国的工作，所以我们扎伊尔人认为全面裁军和普遍和平的问题应由全体会员国来解决，这是合乎协商和互相了解的这种新精神的，而这种精神此后也应作为我们组织工作的基础。

扎伊尔支持任何旨在实现全面裁军和禁止核武器的倡议，赞成老老实实的政策，不赞成只说大话的政策。我们不能赞同有些国家的态度，它们一方面口里说着裁军和禁止制造核武器与细菌武器，一方面却加紧那些武器的制造、改进和试验。

所以，联合国的一切会员国必须关切全面彻底裁军的问题及禁止制造核武器和细菌武器的问题。必须对几个大国继续施加压力，以迫使它们最后决定销毁那些会永远危害全体人类的武器。

我们组织也必须做保护自然的工作。扎伊尔高度地赞扬联合国在这个领域里所作的努力。我国政府，遵照它的总统，公民蒙博托·塞塞·塞科的倡导，已草拟一个影响深远的方案，来保护对我国人民有难以估计价值的我国的自然环境。

今年定为国际妇女年，在今年里可以看到我国积极地参与了联合国所建议的各种方案的执行工作。虽然扎伊尔的妇女享有跟男人同样的权利和机会，但我国总统仍觉得他应该亲自组织一个今年五月在金沙萨举行的国际妇女座谈会。在那个国际会议期间，来自非洲各国和非洲以外各国的女性代表有机会学习到扎伊尔妇女